

關於蘇聯目錄學的幾個理論問題

“蘇維埃目錄學”編輯部

最近幾年來，蘇聯目錄學家對目錄學理論問題的注意加強了。這種注意表現在“蘇維埃目錄學”論文集集中的關於B.H.捷尼西也夫的“普通目錄學”一書的討論。參加這一討論的有A.B.克連諾夫、O.П.卡爾什諾夫、B.A.尼古拉也夫、И.И.列舍琴斯基（莫斯科）、Ю.П.安基賓娜、M.A.勃列斯克曼、A.K.依麗娜、С.И.卡貝洛夫、H.C.列別捷夫、H.Г.恰奇娜（列寧格勒）、B.T.維加熱柯夫（哈爾科夫）、Г.И.巴克拉德賽（梯比里斯），就“普通目錄學”教材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評論意見。同時，關於B.H.捷尼西也夫該書的討論也已轉變為關於有爭論價值的目錄學理論問題的討論^①。

在1956—1957年間，П.Н.別爾柯夫教授發表了許多涉及目錄學理論問題和目錄學史的文章。實際上這些文章是繼續了在“蘇維埃目錄學”上所展開的爭論，雖然П.Н.別爾柯夫沒有公開地和在論文集上發表文章的作者辯論。B.T.奧里謝夫同樣觸及目錄學本質問題的文章，也引起了普遍的注意^②。許多目錄學家指望，這些理論性的爭論在1957年底出版的圖書館學院“普通目錄學”教科書中將得到解決。

在爭論過程中產生了一些什么不同的意見呢？讓我們來談談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問題。

在蘇聯，目錄學理論是否發展了？關於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例如П.Н.別爾柯夫教授認為，我們在目錄學理論領域內呈現出一種蕭條的景象。

他寫道：“從總的方面來說，可惜我們至今仍停留在不止是10—15年前而是更早以前的目錄學領域的理論高度。”^③ M.K.傑魯諾娃在分析了別爾柯夫的文章之後，具有充分說服力地指出，不能僅僅根據“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一版與第二版中的目錄學定義的對比而得出這樣的結論^④。П.Н.別爾柯夫教授所做出的結論不可能為事實和實踐所証實，因為它不符合實際情況。

在戰後時期，對蘇聯目錄學理論問題的注意一直不斷地在增加着。圖書館學院和大型圖書館常常地——雖然有時不很經常——出版“論文集”和“教學筆記”，在這些出版物中發表了關於目錄學理論、方法和歷史問題的文章和材料。圖書館學院的目錄學教研室編制和出

① “蘇維埃目錄學”第41期，33—44頁，第42期，37—49頁，第43期，33—36頁，第44期，40—49頁，第47期，105—109頁，第49期，94—96頁。

② 奧里謝夫B.T.蘇維埃目錄學的幾個問題——“圖書館員”1957年第10期37—43頁。

③ 別爾柯夫П.Н.：M.B.索庫羅娃所著“1708—1955年國內出版的俄文圖書總目”及目錄學的理論和歷史方面的若干問題。見：M.B.索庫羅娃：1708—1955年國內出版的俄文圖書總目，第2版，列寧格勒，5—6頁。

④ 傑魯諾娃M.K.俄文書目之書目著作（評論）——“蘇維埃目錄學”第47期1957年，105—106頁。

版了目录学课程的大纲、供本科生和函授生用的讲义、教学参考材料。这些材料有的虽然很不完善，但是在这些材料中包含了书目实践的概括和经验的理论认识。

B.H. 捷尼西也夫在他的“普通目录学”（1941年出版第一版，1947年出版第二版，1954年出版第三版）中首要的企图之一，在于把我們关于苏联目录学、关于它的任务和原则、形式和方法的理论概念形成系统。在这里，该著作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是作为图书馆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用的教学参考材料出版的，某些目录学家根据这一点想轻视和不谈B.H. 捷尼西也夫著作的作用，不顾该书在图书馆干部培养和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占有的显著地位。

在战后年代，“目录学”专业的学位答辩论文数量增多了。其中有一些无疑的促进了目录学史和目录学个别理论问题的研究。

在1957年出版了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图书馆学院目录学教研室完成的“普通目录学”教科书。（A.П. 艾亨戈利茨教授主编）

为了正确地估计苏联目录学理论领域内的成就，需要把目录学的发展区分为两个时期：（1）准备时期，当时首先注意于局部方面和个别方法问题的研究；和（2）苏联目录学理论的形成时期。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看法，是M.K. 傑魯諾娃在上述引用的文章中提出并加以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的。在战前年代里，苏联目录学家的注意力集中放在方法问题上，以便适应当时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书目参考材料的数量一年年增加，但是它们的方法水平不高。这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方法问题之所以显得突出的原因。如果认为这是对理论问题研究的障碍，那是荒谬的。相反，目录学的方法的研究成为“解决较复杂的理论问题的准备阶段。这种现象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方法问题和理论的关系很紧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1930年初，苏联目录学还没有积累起为总括理论系统的必要的经验与材料，目录学的苏维埃方法没有创造出来，我們不得不‘让路’和从事于研究方法问题”[●]。

现在我們已经可以说苏联目录学的理论形成了。不错，它还不成熟和存在着发展中的缺点，其中有許多矛盾和问题，但是它已经存在。它在概括被积累起来的材料和苏联目录学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然而，目录学的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显然落后于共产主义建设的需要，赶不上书目工作的实践。在这里，我們和П.Н. 别尔柯夫教授没有分歧意见。一部分苏联目录学家公开直接地或隐蔽暧昧地否认目录学理论的存在，这种情况对于目录学理论的落后，起了不少的作用。

这里我們来谈谈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苏联目录学家中引起意见分歧的。这就是：目录学有没有自己的理论？

B.H. 捷尼西也夫认为目录学仅仅是一种实践活动，他绝口不提目录学的理论。甚至连“目录学”这个词，按他的意见也仅能作为这样两个意义来使用：“（1）‘书目事业’，‘书目工作’，就是说，只是作为科学、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方面的一种活动部门。（2）‘书目材料’，也就是图书索引，推荐书目单和书目评述等等”[●]。

● 同上105頁。

● 捷尼西也夫 B.H. 普通目录学，莫斯科，1954年，5頁。

但是還在1930年，甚至更早一些的時候，傑出的蘇聯目錄學家 H.B. 茲多布諾夫和 Л.Н. 托羅波夫斯基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使用“目錄學”這一術語的。（不錯，在他們的表述里是有矛盾的，但我們在這裡不去談它。）

H.B. 茲多布諾夫寫道：“現在應該充分相信這一點，即沒有理論基礎，書目實踐是不可能合理地建立起來的。缺乏這種基礎，就會妨礙目錄學成為它應該成為的東西，就會把目錄學降低到進行手工作業的水平，損害目錄學的重大意義。”他又寫道：“目錄學可以是理論的和實踐的。理論的目錄學研究書目工作的方法，把對書目實踐的觀察加以總結和系統化。實踐的目錄學從事對出版物的探討和系統化。”[●]接着，H.B. 茲多布諾夫解釋了他對於實踐的目錄學的理解。

Л.Н. 托羅波夫斯基是把“目錄學”這個詞作為“知識的一個部門”的意義來使用的，他承認研究目錄學理論的必要性。他認為目錄學是知識和科學活動的一個部門，托羅波夫斯基的意見即使在今天也會引起很大的注意。在1930年托羅波夫斯基在論述到目錄學理論問題時寫道：“沒有良好的理論，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實踐。”然後他又遺憾地繼續說：“實際上，研究書目工作系統的原則和方法的目錄學理論，我們還沒有。……”從這句話可以看出，Л.Н. 托羅波夫斯基是把目錄學理論理解為一種關於書目工作的系統的原則和方法的學說的。同時他反對圍繞目錄學理論問題所進行的令人難解的、繁瑣的爭論，反對去“尋求目錄學中孤立的‘內在的’本質、規律和結論。”正因為如此，他強調指出：“必須肯定地說，目錄學是實踐性極強的科目，它的理論應該完全為實踐服務並且根據這個詞的具體而狹窄的意義接受實踐工作的檢驗。”[●]

1936年12月，舉行了全俄圖書館學、目錄學理論問題會議。托羅波夫斯基在会上作總結時又指出，“目錄學的理論和書目工作方法的 research 是薄弱的”，“在目錄學理論的研究方面還做得非常之少”。他寫道；“會議強調指出，……目錄學是‘知識和科學活動的一個部門。’”[●]然而，在那時，蘇聯目錄學的理論處於萌芽狀態，這就妨礙了托羅波夫斯基明確地區分“知識部門”和“科學活動”的概念，而後者他是理解為書目工作的實踐的。現在，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確定另一点：即早在30年代，目錄學已經不僅被看作是實踐活動，而且也看作一個知識部門，並且提出了研究目錄學理論的問題。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談談 B.H. 捷尼西也夫所下的目錄學的定义。它是這樣的：“目錄學是思想工作的一個部門，它根據書籍的思想性、科學性及實踐價值來揭示書籍財富的內容，從而使勞動人民在使用它們時得到便利。”這個定义的不令人滿意的地方，前面已經指出，首先在於他把目錄學的實質僅僅歸結為實踐工作，而否定了目錄學理論的存在。而且即使作為書目實踐的定义，它也是不完備的。因為沒有強調出目錄學的通報和宣傳的職能。有許多作者在“蘇維埃目錄學”上發表的文章中都指出了這一點。如果採用 B.H. 捷尼西也夫的定义的話，那麼統計登記性的書目便要排除在書目事業之外。

● 茲多布諾夫 H.B. 州（邊區）的書目基礎，第2版，莫斯科——列寧格勒，1931年，8—9頁。

● 托羅波夫斯基 Л.Н. 蘇維埃目錄學的任务——“圖書館學與目錄學”1930年，第1—2期30頁。

● 托羅波夫斯基 Л.Н. 圖書館學目錄學會議中的目錄學問題——“紅色圖書館員”，1937年，第4期55頁。

И.И. 列舍琴斯基在“論目录学的理論和实践”(“苏維埃目录学”第42册, 1956年第37—44頁)和B.T. 維加热柯夫“論目录学对象”(“苏維埃目录学”第44册, 1956年, 第40—45頁)的文章中表述的是另一种观点。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論点可以归納如下: 書目实践——这是丰富的多方面的活动領域, 它包括書目参考材料的編制, 圖書內容的提要, 圖書评价等等, 总之, 这是一种通報和宣傳出版物的工作。目录学是由于社会的一定的需要, 由于圖書的大量出版和幫助讀者选择这些書籍的必要性而产生的。而關於出版物的通報和宣傳, 就使圖書在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广泛流傳。目录学有它自己的理論。在讀者中通報和宣傳出版物的实践活动, 就是它的对象。目录学的理論总结書目工作的經驗, 确定它的科学的原则, 幫助实践找到通報圖書、宣傳出版物和指导閱讀的有效形式与方法。書目实践和目录学理論是互相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我們認為, “普通目录学”教科書的作者們的下述观点接近于正确: “……必須对書目工作的方式方法加以科学的研究, 为此, 就需要知道在过去是如何进行書目工作的, 也需要总结苏联和外国現代書目工作的极为丰富的經驗。为了使書目工作有效地发展和深入, 必須了解目录学的社会功用, 闡明目录学在发展科学、文化、出版事业、艺术和教育事业中的地位。換句話說, 必須研究目录学的理論問題、历史問題和方法問題。”●

由于我們还没有論述普通目录学的基本理論的著作, 因此新編的“普通目录学”教科書中对于現代苏联目录学理論所包含的各种問題的范圍, 就提出了一个近似的概念。这本教科書的各个章节是这样的: “苏联目录学的任务和原则”、“苏联目录学的方法和書目的种类”、“革命前俄国目录学的发展”、“苏联目录学的发展与現状”、“圖書館書目工作的組織”、“圖書館的書目参考工作的机构”、“推荐書目材料的編制法”、“圖書館的書目参考工作”、“圖書館的情報工作”。

虽然教科書不能确切地反映出目录学理論問題的范圍; 但从上面列举的章节看来, 我們总算找到關於什么是目录学的对象这个問題的答案。同时应当指出, 在苏联目录学发展的現阶段, 目录学理論也要研究历史問題和方法問題。

教科書的許多章节的作者是以存在有目录学理論(它总结了書目实践)的事实为出发点的, 然而在由作者們集体編写的教科書中, 却出現了矛盾。矛盾特別看得明显的是在第一部分, 即是于1954年出版的而略加修改的M.A. 勃列斯克曼“目录学引論”这本小冊子的全文。

M.A. 勃列斯克曼承認目录学理論的存在, 并把目录学称为輔助的課程, 但是他沒有給予明确的定义。在使用“目录学理論”和“書目实践”的术语时, 他沒有解釋什么叫做書目实践, 什么是目录学理論, 它們之間有无关系, 它們之間如何区别。在論述到作为一門科学的学科的目录学时, M.A. 勃列斯克曼把它和書目工作的任务混为一談。B.T. 維加热柯夫写道: “勃列斯克曼企图用一个公式給目录学各个部門下一个万能的定义, 結果一下子就把目录学理論和書目实践都忘記了。按照他的公式, 就得出这样的結論: 理論和实践同有一个对象, 作为一門科学的目录学, 是理論和实践的混合。理論和实践是沒有区别的, 目录学的对象就是‘出版物的研究’。”●

● 普通目录学, 圖書館学院教科書, 莫斯科, 1957年, 第6—7頁。

● 維加什柯夫 B.T. 論目录学对象——“苏維埃目录学”第44册, 1956年, 41頁。

在教科書里，这些定义沒有加以根本的修改。例如：“可以把目录学确定为一种輔助的課目，它从可以促进出版物的傳播和利用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出版物”[●]。目录学的对象在这里被确定为“出版物的研究”。可是教科書的整个內容却和这个定义有明显的矛盾。我們看到，教科書中所闡述的不是研究出版物的問題，而是書目工作的問題。教科書的作者們沒有听取对这些模糊的、不确切的定义的批評，因而增加了对于苏联目录学实質的正确理解的困难，这只能使人表示遺憾。

П.Н. 別尔柯夫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表明立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表示承認目录学是一門科学，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目录学仅仅是一种实践活动。

在分析“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所刊载的目录学定义时，他解釋說，“知識”是“科学”的同义詞，因此，“目录学是知識的一个部門”的定义，應該这样来理解，就是目录学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一个分支，一个部門”。不仅如此，他还認為有充分的根据来“承認目录学是一門科学，而不是一門被謹慎地伪装起来的“知識的部門”[●]。

П.Н. 別尔柯夫在他的另一篇題为“目录学和科学工作”的文章中又認為，作为一門科学的目录学在当前是由三个基本部分組成的：書目史科学、書目查考法和書目編制法。正如尼古拉也夫所正确地指出的，在这个方案中沒有目录学史和目录学概論的地位[●]。П.Н. 別尔柯夫給自己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确定目录学在科学工作中的作用和揭示作为社会現象的目录学的实質，但是他所作出的目录学的定义，和我們前面所引用的他的論断却根本相反。他已經閉口不提科学了，只是把目录学看作一种实践活动。广而言之，这个定义又可以表述为：“……目录学不是關於編制和研究出版物的書目单、索引和評論的方式方法的知識的一个部門，而是对某个人、团体、以至整个民族的对民族文化，也就是对世界文化所作的貢獻的統計、登記、和傳宣工作，这些表現为出版物（确切点說，不只是出版物）的一覽表、目录、索引、指南和評价等形式。”^④

就这样，П.Н. 別尔柯夫教授剛剛还認為目录学是知識的一个部門，或是一門科学，現在他竟断言目录学不是知識的一个部門，而是“統計、登記、和宣傳工作”，也就是書目工作。在那篇文章中，П.Н. 別尔柯夫教授接着宣布目录学是一門“普遍的、必需的輔助科学”。看来，他这样做，是为了証明这么一个簡單而重要的观点，即科学工作者在目录学方面應該有很好的修养，懂得一般的和自己专业方面的書目著作，并善于利用这些著作。П.Н. 別尔柯夫教授在为 M.B. 索庫罗娃的書所写的序言中又說：“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目录学應該是一門独立的和极为重要的科学，同时它的某些章节又是每一門科学的組成部分。”（11頁）

要証实这种观点，通常援引 Л.Н. 托罗波夫斯基的話（例如 В.Г. 奧里謝夫在自己文章

● 普通目录学，圖書館学院教科書，莫斯科，1957年，9頁。

● 別尔柯夫 П.Н.：M.B. 索庫罗娃所著“1708—1955 年国内出版的俄文圖書总目”及目录学的理論和历史方面的若干問題。見 M.B. 索庫罗娃：1708—1955 年国内出版的俄文圖書总目，第2版，列宁格勒，1956年，11，13頁。

● 尼古拉也夫 B.A.、M.E. 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圖書館“論文集”中的目录学理論和方法問題。

④ 別尔柯夫 П.Н. 目录学与科学工作——“論文集”（国立 M.E. 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第Ⅲ(6)，1957年，104頁。

里就是这样做的)。托罗波夫斯基在1937年这样说过：“目录学在知识体系中的特点在于，它具有一系列的为它所独有的方法，方式和要求，同时它在内容上与知识的某些部门也有不可割裂的联系。目录学是进行科学研究或掌握知识的必要的阶段，因而它就成为科学的各个专门与教学的各个专门科目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托罗波夫斯基在这里指出了书目参考资料与书目在服务于所有知识部门与所有科学部门中的巨大作用。他同时也谈到，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了解书目材料，并善于使用它们，也就是说应具备基本的目录学知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托罗波夫斯基才认为目录学是科学的各专门分支和教学的各个专门科目的组成部分。至于说到目录学的理论，那么它有自己特有的对象，自己的原则与一系列专门独特的方法、方式、要求，它不可能成为其他科学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引证的Л.Н.托罗波夫斯基的这些话，并不能提供任何根据来说明目录学是一门普遍的辅助科学（或辅助学科），是其他各门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些苏联目录学家否认目录学理论的存在和研究这一理论的必要性。但他们不是直接地，而是隐晦地表明这种观点。B.T.奥里谢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他的“苏维埃目录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正确地批评了П.Н.别尔柯夫与Н.И.马楚耶夫教授对苏联目录学状况所作的否定的评价。在他这篇文章中，也完全正确地提出了目录学的党性问题，并且批判了轻视推荐书目和企图重新要求复活“详尽无遗的书目”的人。

在同一篇文章中，B.T.奥里谢夫也批评了一些目录学家在目录学实质上所表露的观点。除了B.T.维加柯夫以外，他没有指出他们的姓名，但十分明显，他所批评的是B.A.尼古拉也夫，O.П.卡尔什诺夫，И.И.列舍琴斯基等青年目录学家。B.T.奥里谢夫把他们的观点和П.Н.别尔柯夫教授以及A.Д.艾亨戈利茨教授的观点相提并论了，虽然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B.T.奥里谢夫所反对的某些见解，根本不知道是谁发表的。例如取消书目编制法（библиографирование）的研究，要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在实践中停止对编制法的检验，而让实际上并不从事书目工作的人去研究，这个荒谬的建议就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B.T.奥里谢夫没有说明什么是目录学对象，虽然他的文章中有一个专门部分来谈这个问题。所有这些都使人难于理解文章的作者在目录学实质上所持的观点。

在有一个地方，B.T.奥里谢夫称目录学为一门科学的学科，但实质上，他又把目录学理解为实践活动的一个部门，其任务是“对图书进行研究，以达到读者利用它们的目的”。按照B.T.奥里谢夫的意见，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合而为一的。但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解释。要使目录学的理论和实践区别开来，他却认为这是在它们之间造成“人为的分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B.T.奥里谢夫却理解为它们的同一。B.T.奥里谢夫并不希望区别理论与实践，在他的见解中也没有目录学理论的地位，他公开反对去建立（按照他的说法是）“一门新的科学，即凌驾在实践活动之上的目录学”。

这种立场，正和否认苏联目录学理论的存在和其他一些目录学家的立场一样，客观上会导致对书目工作经验的科学的总结，无法确定这种工作的目的、原则与方法，也不能说明书目活动的本质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在发展科学中的作用。理论工作被宣布为臆造的、没有成效的，不需要的。新起的目录学工作者本来可以以总结了所积累的经验并给实践指示途径的理论为指南的，但却不得不在实践中独立地去摸索自己这个工作的原则与形式。这样的路线是不能使目录学工作者（实践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在进一步改善书目为读者服务的技能

上选定正确的方針的。

还在不久以前，在理論方面的漠不關心的态度，使得候补博士学位論文及目录学方面的其他科学著作的題目，大部分不能符合发展目录学各种任务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实践的需要。目前，目录学的思想的发展，已經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不能認為，我們已經克服了理論脱离实践的状况。再也不要攻击那些热心于发展目录学理論并使之更为完善的人了，而是應該幫助他們在工作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克服至今还存在的目录学落后于共产主义建設的需要的情況。

因此，为了給目录学实践指明途徑，目录学的理論能够存在，也应该存在。这样的理論已經存在着并且在发展着，虽然它还处于形成阶段。正因为如此，它需要各方面的注意与不断的改进。目录学理論的对象不是出版物，而是在讀者中通報和宣傳圖書的活动。應該支持某些青年目录学家在这一問題上所表示的意見。他們促使我們更正确地解决目录学中的一些基本問題。虽然我們的見解并不是始終如一的，虽然我們也沒有解答出許多极为重要的問題。特别是目前目录学理論所研究的对象的定义还太一般化。B.T. 維加柯夫在文章里說得对，不能把目录学工作的方法与科学研究的方法混淆起来。無疑的，目录学理論有它自己的独有的研究方法。然而，这一正确的見解，目前还没有在實踐中加以令人滿意的研究。

在深入地研究目录学家的实践活动和目录学工作的劳动成果的利用者的需要的基础上，为了探討所有最重要的目录学理論的問題（例如确定書目工作的目的，揭露書目各种功用与种类之間的联系与依賴關係，說明并制訂能使工作取得它所要求的良好效果的原則和方法），还有許多工作要做。总而言之，应当竭力使目录学理論万无一失地指引实践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与前景。

正在探討的目录学理論問題之一是關於書目的种类問題。在这种情况下，書目被理解为書目工作及其成果——書目参考材料。

在辯論的过程中，出現了几种观点。大家知道，在B.H. 捷尼西也夫的“普通目录学”一書中，把書目分为四大类：統計登記性書目、通報性書目、推荐性書目和批評性書目。在“普通目录学”教科書中，統計登記性書目、推荐性書目和批評性書目被称为三种基本的書目。Ю.П. 安基賓娜，M.A. 勃列斯克曼和H.C. 列別捷夫在他們的文章里，也提出了这样的划分。（“苏維埃目录学”1956年第42期第45頁）。

也是在“苏維埃目录学”上发表的A.B. 克連諾夫、B.A. 尼古拉也夫、O.П. 卡尔什諾夫、И.И. 列舍琴斯基等人的文章中，否認了批評性書目作为单独的一种書目的存在，同时A.B. 克連諾夫和И.И. 列舍琴斯基在这个問題上提出只分为統計登記性書目和推荐性書目两种。B.A. 尼古拉也夫和O.П. 卡尔什諾夫也持有这种观点。但是他們容許可以把統計登記性書目“細分成向讀者報導国家全部出版物的国家目录，包含各个知識部門著作的科学情報書目、書笈营业目录等等”。

無疑，書目参考材料的目的性和讀者用途是划分書目基本种类的最正确的原則。从这个前提出发，据我們看来，应分为統計登記性書目、科学情報書目和推荐性書目。除了取消科学情報書目和推荐性書目之間的界限以外，（有这种見解的拥护者），还取消統計登記書目和科学情報書目之間的界限，这就使得每一种独立存在的目录的独特作用变得模糊起来，并且迫使它們失去固有的任务。

各种目录都负有向读者通报出版物的使命，它也是为完成这种使命的宣传工具。但每一种目录都有自己独特的任务，它取决于所通报的读者对象。

苏联的统计登记性书目以国家出版物的登记和统计为根据。B. H. 捷尼西也夫在他的教科书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个特点。出版物的统计目录根据一定的样本是国家登记的一种形式。统计登记性书目服务于各种类型的读者，但通常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图书馆和科学机关，它们是国家出版物目录的主要订户。应该同意“普通目录学”教科书作者所说的：“不广泛地利用统计登记性书目，就不可能有良好质量的参考目录和图书馆任何一种形式的通报工作，因此将统计登记性书目发展正确地视为发展其它各种目录必不可少的条件”。（24页）

科学情报书目服务于一定的读者对象，包括科学工作人员、高等学校教师、直接参加生产的专家等等。为了强调完成它的科学辅助作用，有时这种书目被称为“帮助科学工作的目录”，“科学辅助目录”。最近开始用专门术语“科学情报书目”。照我们的看法，这个术语比其它字都更为恰当地表现了这种书目的本质。可见，根据专门读者用途的科学情报书目不同于统计登记性书目，它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固定的读者、组织目录材料的独特方法。（我们以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文摘杂志为例，它已成为专家不可少的参考材料）。科学情报书目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有重点的，这要看它满足读者的需要而定。它对出版物的评述有一个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以它的专门的读者用途为先决条件的。

不久以前，人们没有把科学情报书目作为一种独特类型加以研究，这种情况影响了它的特点的阐明及其原则和方法的研究。只要翻阅一下“普通目录学”教科书，就足够说明对科学辅助性质的参考材料的重视，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都与它们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相称。

推荐书目的任务是宣传出版物。它是指导阅读的主要方法之一，服务于广大的读者。推荐书目以登记、统计目录和科学通报书目为根据。关于推荐书目的实质没有分歧意见，因此在评论各种目录特点的时候，可以止于所述。

比较复杂的是所谓批评性书目，这种书目没有固定的读者用途。从“普通目录学”教科书里所提供的目录的各种方法和种类，我们除了得知批评性书目“不仅指导读者……还指导作者和出版社”，（29页）我们还从教科书中得知：“对出版物（特别是最近的）进行分析和评价是批评性书目的基本任务，揭示书写的思想意义、优缺点、符合不符合政治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要求，批评性书目创造性地研究出版物的最新成果”。（28页）但须知这里所说是科学和文化评论的任务，书中为何将评论称之为“批评性书目”呢？这个问题来源于“批评性书目”这一章的系统内，在这一章里，非常正确地叙述了评论材料应当如何利用在目录学和图书馆工作方面，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评论材料当作书目的一个种类。

“批评和评价新出版物的重要任务通过它的书报评论方法来实现，（我们在教科书中读到的）写书报评论是批评性书目揭示出版物的内容、分析和评价出版物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方法是批评性书目本身所固有的。批评性书目特具的两种组织材料形式：报刊中的批评性书目和批评性书目杂志。批评性书目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是编辑和定期发行机关的职责”。（301页）

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稍微熟悉几种现在的杂志和报纸，都会明白，在批评性书目部分中通常包含有两种材料：第一种，论文、概述和评论；第二种，书籍简介或非简介目录、书

評、个别的評註等等。第一种資料乃是科学和文学的評論；第二种資料对于書籍进行实际的有目的的报导，并不涉及对它的詳細評述。有根据把它們列入“批評性書目”的范疇嗎？当然沒有，因为这只是变相的科学情報書目或推荐書目。恰巧我們看到，無論在党的那个決議中都沒有这个术语，“批評性書目”的拥护者是如此喜欢以党的規定为借口，而大談其評論和目录，并且确切地区分这样的和那样的功用。

在 Ю.П. 安基宾娜、M.A. 勃列斯克曼和 H.C. 列別捷夫的文章中斷言，短評和簡介之間沒有原則的區別，并且引証多余的論据贊成“批評性書目”，但是不看出这种區別是困难的，尽管举出一些实际例子要比較容易。我們很好地掌握了列宁对于 H.A. 魯巴金的書目“在書籍中間”的著名的評論，列宁論証了目录学的重要的党性原則，同时有区别地对待俄罗斯目录学家的卓越的著作，这样，他的短論不只是簡單地对个别作品的評價，同时也是对发展目录学理論上的一个貢獻。短論它是对一本書或一个作品的科学分析，这种分析常常发展为研究，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各种簡介也能在各方面自命为最輝耀、最典范的嗎？簡介的任务比較簡單——揭示書籍內容、指出其科学或艺术价值，在必要时給予評價，不加詳細分析地指出作品好的或差的方面。

我們認為在 B.A. 尼古拉也夫和 O.П. 卡尔什諾夫的文章中（“苏維埃目录学” 1955年第41期第36—37頁）使人信服地証明了評論材料不能称为“批評性書目”。A.B. 克連諾夫同意 B.A. 尼古拉也夫和 O.П. 卡尔什諾夫的很多結論，他对 Ю.П. 安基宾娜，M.A. 勃列斯克曼和 H.C. 列別捷夫的文章中各方面的論据做了一系列的极重要的評論，并举出很多实例說明这些作者对于“批評性書目”概念的內容沒有明晰的和确切的概念。

如上所述，得出的全部結論認為“批評性書目”是不能作为一种目录而存在的。評論和目录之間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在現在的書目实际工作中有三种主要的基本的書目：統計登記性書目、科学情報書目和推荐書目。

關於苏联目录学一些重要理論問題的辯論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結論，这篇文章也不强求作这种結論。辯論的好处在于能够提高目录工作者对于理論問題的兴趣和使得我們对于一系列的爭論問題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无疑，假如很多重要的圖書館的書目工作者以及其它各門科学的代表和圖書館学院的教師們一样参加辯論的話，那么辯論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最好能成为苏联目录学理論問題大辯論的組織者，但是它却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把組織統計学的辯論和組織目录学理論上一些爭論問題的討論充分比較一下，可以看出，在我們的工作中还有許多手工业方式。正如科学院院士 K.B. 奥斯特罗維加諾夫在“統計学辯論總結”一文中所写：“为了討論爭論的問題和研究統計学的对象与方法，苏联科学院、中央統計管理局和苏联高等教育部从三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举行了統計学問題的科學會議，应邀到会的有七百六十人，包括列宁格勒、基輔、明斯克、巴庫、塔什干、梯比里斯、里加、埃里溫、阿拉木图、哈尔科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伊茨克的代表。参加會議的主要成員有統計学各方面的科学工作人員和实际工作者，同他們一起参加會議的还有經濟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哲学家和医生。關於統計学的对象和方法問題会前就存在着爭論，并且在“統計学通報”和“經濟学問題”两杂志上进行过辯論。苏联中央統計管理委員會組織的集体創作“統計学理論”和苏联高等教育部莫斯科經濟統計学学院集体創作的“普通統計学理

論教程”教科書初稿都被作为資料散发給會議參加者。有六十人在会上发了言，另有二十人提出了書面发言。为了在全体大会上作出工作總結，會議还选举了由二十九位具有不同見解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委員會将会議工作總結的決議草案分送給到会者，考虑到在决定工作總結时獲得的很多补充意見，以便进行修改”●。

組織統計学大辯論方面的經驗，可以作为解决很多理論上爭論問題的范例。只有圖書館学院、科学和大众圖書館、圖書局和科学情報研究所以及各个知識領域的多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組織的集体努力，才能正确地解决目录学的許多爭論問題。

（陈光祚、楊紹光、李平傑譯，刘麟校）

-
- 托罗波夫斯基 Л.Н. 圖書館学目录学会議中的目录学問題——“紅色圖書館員”，1937年，第4期55—56頁。
 - 奥斯特罗維加諾夫 К.В. 統計学辯論總結（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會議上的报告修改本）——苏联科学院通訊”1954年，第8期第4—5頁。